抗战时期大后方图书文献土纸使用情况分析

——以五家出版机构为样本

荣　杰

摘　要　在实物对比分析的基础上,梳理了国家图书馆馆藏中所见手工土纸和机制土纸的名目、外观及品质,并对馆藏五家出版机构在1937—1946年间出版的图书进行采样统计,同时结合相关史料,对抗战时期大后方印刷用土纸的使用情况进行了初步梳理,分析认为:自1938年下半年开始,土纸在大后方印刷出版界的使用日益广泛,1946年后土纸基本退出我国印刷出版行业。最后提出了进一步加强抗战时期土纸文献保护利用的建议。表4。参考文献25。

关键词　民国时期　文献保护与利用　印刷用纸　土纸　国家图书馆藏

Usage Analysis of Hand-Made Paper of Literature in The Rear Area during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Taking Five Publishing Agencies as an Example

Rong Jie

Abstract: Based on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material object, the name, appearance and quality of hand-made paper and machine man-made paper collected by the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was sorted. Combined with relevant historical data, and based on sampling and statistics of books that was published by 5 publishing agencies from 1937 to 1946 and collected by the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the applied situation of man-made paper for printing in the rear area during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was initially summed up. This paper concluded that man-made paper started to be widely applied for publication in the rear area from the second half of 1938 and basically withdrew from the publishing industry since 1946. It is suggested that it i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the protection and application of man-made paper documents during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4 tabs. 25 refs.

Keywords: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Protection and Application of Literature; Printing Paper; Hand-made Paper; Collections of the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抗日战争从全面爆发到胜利的八年时间,是民国出版史上一段较为特殊的时期。这一时期,原本集中在上海的出版机构几经辗转,西迁到四川、广西等大后方地区,主要集中在重庆、桂林;同时,成都、昆明等城市也成为重要的出版业集散地。受大后方地区进口纸供给量锐减和现代造纸工业基础极其薄弱的影响,大后方地区骤然增加的印刷用纸需求难以得到满足。在这种情况下,当地土产的纸张遂成为大后方地区文化用纸的重要来源,时人一般笼统称之为"土纸"。由于这种纸张与民国其他时期普遍使用的进口机制纸在外观上有较大差异,因此这一时期出版的"土纸书"与其他时期的出版物相比也就有着明显的差别。可以说,土纸书是这一特殊时期出版史上的独特现象,在民国出版史研究、民国文献保护研究中值得注意。笔者曾在国家图书馆民国图书库工作数年,本文将在国图馆藏民国图书实物统计分析的基础上,结合相关史料,围绕土纸的基本特点和土纸使用的相关情况进行初步分析。

1　土纸的基本特点

所谓"土纸",是一个并不严谨的概念,更多是和进口"洋纸"相对而称。如《四川手工纸业调

DOI: 10.13666/j.cnki.jnlc.2019.0312

查报告》中说,“在抗战前,市面所销之纸张,仍以土纸为多,洋纸仅占十分之一左右”[1](1);莫古黎(F. A. Maclure)在《广东的土纸业》中也以“中国土纸”指称国产手工纸[2];再如,《申报》所登《本港粤桂闽土纸市况》称“我国粤闽桂各省出产土纸最为大宗,常年输出颇占重要地位,嗣因洋纸倾销,土纸市场遂蒙极大之影响”[3]。由此可知,时人所谓的“土纸”主要是指国内用传统原料和传统工艺手工制造而成的纸张。事实上,除了传统的手工纸外,战时大后方的一些造纸厂也就地取材,采取半手工、半机制的方式制造机制土纸。因此,本文所指“土纸”既包括大后方生产的手工土纸也包括就地取材所制造的机制土纸。

1.1 手工土纸

1.1.1 手工土纸的外观

概括而言,手工印刷纸的外观大体有如下共同特点:(一)纸张呈现出比较清晰的横纵交错的帘纹。(二)纸张颜色以深浅不一的黄褐色居多,较为常见的颜色还有青灰色;此外,还有少数纸呈绿色,如《青年与革命》(湖北省政府教育厅编,新湖北书店经售,1941 年 7 月出版)、《大时代中的青年问题》(简贯三编著,青年书店(重庆)1941 年 6 月初版)、《丁郎约三事》(许里著,生活书店(重庆)1940 年 3 月再版)、《国际政局的动向》(国民出版社,1940 年 3 月初版)。(三)纸张表面粗糙,可见明显的纤维状杂质,破洞、透墨现象也较为常见。(四)纸张厚度不一,大多数较薄,翻页时有“粘手”之感,纸张基本没有脆化现象。

从实物看,即便同一种类的手工土纸,其外观有时也存在差异。比如,同为熟料纸,《行业组织与近代思潮》(商务印书馆,1943 年 12 月初版)的纸色就是黄褐色,《国史大纲》(上册)(商务印书馆,1944 年 1 月渝一版)则为青灰色;而《战时苏联游记》(中外出版社,1945 年 7 月初版)一书中黄褐色、青灰色纸张同时存在。至于纸张的厚度,相同种类也有差异。比如《事务管理概要》(商务印书馆,1943 年 7 月初版)和《中国行政新论》(商务印书馆,1943 年 7 再版)同用粉报纸,但《事务管理概要》的纸要比《中国行政新论》的薄得多,质量差异明显。有时,同一本书里的纸张也会有明显的厚薄之分,比如《非常时期过分利得税之理论与实际》(独立出版社,1944 年 9 月初版,生料纸)即是如此。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是手工土纸的生产工艺标准化程度比较低,导致产品质量不够稳定。

1.1.2 手工土纸的名目及品质

传统手工土纸的名目非常繁多。1943 年出版的《四川手工纸业调查报告》中列举的四川夹江、梁山、铜梁、广安地区出产的可用于印刷的纸张名目,就有十余种之多(土报纸、粉报纸、土新闻纸、新闻纸、大对方、小对方、贡川、勾连、漂白元边、书连、罗表、花坯、漂粉、本旨、夹江、毛边、报纸)[1](25,61,103-104,132-133)。但是,大部分“土纸书”上是不注明所用纸张的具体名目的,因此无法对不同种类纸张进行比较。好在少数出版机构(如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或许是出于销售管理的需要,会在出版物上注明所用纸张名目,这为比较不同种类纸张的品质差异提供了一些样本。兹将所见名目罗列如下:熟料纸、生料纸、浏阳纸、粉报纸、夹江白报纸、重纸(江西重纸)、漂白纸、上白土报纸、改良纸。

不同名目的手工土纸的品质有所差异。这种差异的比较,可以通过图书价格来体现,一些图书采用两种手工土纸印制,价格的高低差异自然也反映出所用手工土纸张的品质高下,见表 1 所示。

表 1 不同类型手工土纸图书售价对比

书名	出版时间	出版机构	用纸及价格对比	
《巴黎的陷落》	1945. 10	正中书局	浏阳纸 4. 2 元	熟料纸 3. 5 元
《战后问题论文集(第四集)》	1945. 2	独立出版社	浏阳纸本定价 4. 5 元	熟料纸本定价 3 元

续表

书名	出版时间	出版机构	用纸及价格对比	
《哥隆克人》	1944.9	文风书局	生料纸120元	熟料纸180元
《从叔本华到尼采》	1944.5	在创出版社	生土纸75元	熟料纸100元
《朱执信文存》	1944.11	中国文化服务社	生料纸本国币定价3.8元	熟料纸本国币定价5元
《西行乱唱》	1943.10	五十年代出版社	土纸国币12元	浏阳纸国币24元
《法律概论》	1944.12	大东书局	生料纸本定价国币3元	熟料纸本定价国币4元
《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	1943.12	中国文化服务社	生料纸本国币100元	熟料纸本国币130元
《桑弘羊及其战时经济政策》	1944.3	中国文化服务社	土纸本国币20元	熟料纸本国币30元

由表1内容可见,不同手工土纸的价格由高到低排序依次为:浏阳纸、熟料纸、生料纸。根据笔者对一定数量实物的观察,这个排序也正好是三种纸品质由高到低的排序。从所见实物看,江西以及广东曲江印刷的图书所用纸张,或者江西所产纸张(江西纸/江西重纸),虽薄但韧性好、纸浆分布均匀、杂质较少、罕见孔洞、手感细腻,品质通常优于川版图书纸张。

1.2 机制土纸

实物所见,机制土纸的共同特点主要有:(一)纸张表面大多较为粗糙,可见较为明显的点状或纤维状杂质;(二)没有横纵交错的帘纹;(三)比手工土纸厚且硬。所见标有具体名目的机制土纸有:龙章新闻纸(如《中国政治制度史·第二册》,南方印书馆1943年6月出版)、正中机制纸(如《出版法规汇编》,正中书局1944年4月初版)、溥泉纸(如《铁路工程·上》,商务印书馆1945年12月初版),以及黔元纸(如《中国通史·第一册》,贵阳文通书局1942年7月初版)。龙章新闻纸颜色较为洁白(接近进口新闻纸颜色),正中机制纸、黔元纸为黄褐色,溥泉纸为青灰色。龙章新闻纸品质最好,与进口机制纸相差无几;其他几种纸品质相当,较龙章新闻纸品质相差不少。

从笔者工作经验和实物统计看,抗战时期大后方绝大部分图书采用手工土纸印刷,机制土纸图书所占比例十分有限。这一情况也可以从史料中得到印证。根据《中国近代造纸工业》一书和《后方造纸业概况》一文所列举的战时大后方具备规模的造纸厂仅有14家,且分布不均:四川境内9家,江西2家,湖南、贵州、云南各1家[4]。另据国民政府主计处统计,从1939到1945年,大后方地区机制土纸产量最高的年份(1941、1942年)也不过每年4200余吨;1938年到1940年,每年不足千吨;1943到1945年各年产量都在3000余吨[4](207)。四川1943年手工土纸产量已达21000余吨[4](216),比较而言,整个大后方地区的机制土纸最高年产量仅及其两成。

2 土纸大量使用的主要原因

在抗战全面爆发之前,由于进口纸张大量低价倾销,且无论品质还是价格均优于手工土纸,致使手工土纸逐渐退出文化用纸领域,基本只限于迷信用纸。抗战全面爆发后,在战时的特殊历史条件下,手工土纸又成为大后方文化用纸的重要来源[1](16)。之所以会出现如此重大的转变,首要原因当然是西南地区成为战时的政治文化中心,文化用纸的需求陡然猛增,而同时纸张的供给能力却严重不足,具体表述如下。

首先,进口机制纸的供给逐步减少。自清末至民国初年,手工土纸逐渐为机制纸所取代,以新闻纸(白报纸)、道林纸为代表的机制纸成为使用最为广泛的印刷纸,而这些印刷纸绝大部分依赖进口[5]。由于世界主要造纸国的大量倾销,国内印刷纸的供给总体上比较平稳。但是到了1936年,机制纸的进口量已经出现大幅下降。究其原因,一是原本大量进口中国市场的加拿大印刷用纸被日本包定半年,“大部份充制造军需品之

用”,同时美国所产机制纸“当无法再运亚洲推销”;此外,“欧洲所产报纸,自木浆采作军用之后,纸张产量亦因而减少,目前欧洲自身对报纸已大感缺乏”[6]。及至抗战全面爆发和欧洲局势日益紧张,能够从国外进口到中国的纸张量日渐减少,且价格不断飞涨。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之时,大后方地区的进口纸供给几近断绝。

其次,交通阻隔。西南地区的交通本不发达,抗战全面爆发后,大量物资向该地区抢运,加之多个交通枢纽地区相继陷落,使得交通运输异常困难。1938 年 11 月 4 日《申报》报道称:“内地各省需用洋纸尚须由本港(即指香港)输入广州、武汉,然后分销于各省市镇间,无形中造成本港洋纸行一绝大机会,年余间营业之开展猛进为向所罕睹,获利之优厚亦出乎一般人意料之外。自×人南侵,广州武汉复相继放弃,而本港洋纸行之货物推销路线惨遭中断。”[7]即便有大宗货源,内地也只能“望纸兴叹”,交通梗阻,助纣内地“纸荒”,此即一例。同时,印刷纸是抢运的重要物资之一,由于重量和体积都很大,基本采用陆路和水路运输,这就更增加了运输的难度和成本;而日寇轰炸、交通事故等原因,造成所运纸张被付之一炬或葬身江心的事也并不鲜见。“1938 年 1 月 12 日,中华书局广州分局由粤汉路转运汉口办事处书货二千一百余件,中途被炸,损失八百七十二包。另有汉口办事处先后三次转运重庆分局书货,搁置宜昌,无轮船装运。由渝局派人前往雇民船起运,途经万县时一船沉没,装书五百余包,又派员去万县雇工摊晒,损失四成。”[8]从这条记载,不难推测抢运物资的艰难和损失之巨。

在这样的背景下,西南地区出产的土纸就成为替代进口机制纸的现实选择。以四川省为例,《四川手工纸业调查报告》记载,战前“报纸及新式印刷所用之纸”主要为“洋纸”;抗战以后,“以书写及印刷用之土报纸需要增加,出品供不应求”[1](1)。据记载,“抗战暴动以后,随着战局的扩大,沿海商埠的沦陷,舶来品的洋纸来源被遮断了,于是横江纸推销市场更获得了新的广大的出路”“加料加工制造的重纸的品质非常适宜于新式印刷品印刷机之用”“每月的推销额差不多是加速度的几何级数的增大”[9]。

3 抽样分析与统计结果

为了能比较详细地说明当时土纸的使用情况,笔者从国家图书馆所藏战时大后方地区的五家出版机构所刊印图书中,随机抽取出一定数量的样本进行统计,同时结合有关史料,对土纸的使用情况进行初步分析。

3.1 出版机构的选取

笔者选定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开明书店、生活书店、独立出版社(全面抗战爆发前,前四家总部设在上海,独立出版社设在南京)作为抽样对象。理由如下:

首先,出版机构规模。五家出版机构中,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是民国时期我国出版业的两大巨头,无论资金规模、雇员数量、经营范围,还是出版物数量都是其他任何一家出版机构所望尘莫及的。开明书店和生活书店的规模,按照当时的标准基本算作中等书局。而独立出版社则算是小书局。其次,出版机构类型。从出版范畴看,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都属于综合性出版机构,出版物涉及各个领域。开明书店和生活书店则更多侧重于文艺类和社科类书籍的出版。独立出版社大体以政治宣传性著作和文史著作居多。五家书局除了出版图书外,均从事期刊发行工作。从书局的资本背景看,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开明书店都是民营书店,资金主要依靠社会募集,采取股份制的经营模式。生活书店也属于民营书店,但未采取股份制经营模式。独立出版社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举办,是当时主要的“官办书局”之一。第三,造货布局。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开明书店和生活书店在抗战全面爆发后,组织管理中枢和编辑发行机关西迁,同时将上海、香港作为主要的造货基地,后因战事所迫才将造货基地转移到大后方地区。独立出版社则主要选择在大后方地区安排造货。

一方面,出版机构规模、资本实力和背景,以

及造货布局都是影响出版物用纸的重要因素,这五家出版机构在这些因素方面都有其特点,因此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另一方面,如前所述,大部分土纸书上不会标注所用纸张的具体名目,而这五家出版机构,特别是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的不少书上都明确标注了所用纸张的名目。这对于对比分析土纸的外观特性和品质优劣具有很重要的价值。

3.2 抽样时间段的确定

本文将抽样时间范围定为1937年底到1946年底。原因如下:上海出版业的西迁大体是从1937年下半年开始的,该时间点可以作为出版业西迁的起始点;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大后方地区的出版业开始陆续着手复员东迁,但是大多数是在1946年下半年才完全返回上海,这个时间点可以作为大后方出版业中心角色的结束时点。

3.3 调研结果

本次抽样共得到抽样时间范围内五家书局的图书1157册(含不同版次)。其中,商务印书馆图书316册,中华书局图书238册,开明书店图书98册,生活书店图书149册,独立出版社图书356册,见表2所示。

表2 五家出版机构图书抽样数量及比例

出版机构	样本数量(册)	所占比例
商务印书馆	316	27.3%
中华书局	238	20.6%
开明书店	98	8.5%
生活书店	149	12.9%
独立出版社	356	30.7%
合计	1157	100%

各书局抽样图书的用纸类型及相应时间分布见表3。

表3 五家出版机构抽样图书用纸情况及相应时间分布

出版机构	用纸类型		时间分布	样本数量
商务印书馆	进口机制纸	白报纸	1938.5—1941.9	16
		道林纸	1938.2—1938.4	3
	土纸	熟料纸	1943.1—1946.9	140
		手工纸(渝版)	1942.4—1946.6	40
		粉报纸	1942.10—1943.8	38
		其他土纸	1942.3—1945.6	16
		浏阳纸	1942.11—1946.8	16
		连史纸	1943.11	1
		手工纸(赣版)	1942.12—1944.2	7
		土报纸	1943.7—1945.4	3
		夹江白报纸	1946.10	1
		机制纸(机制)	1942.3—1942.5	2
		溥泉纸(机制)	1945.10—1946.12	33

续表

出版机构	用纸类型		时间分布	样本数量
中华书局	进口机制纸	白报纸	1938. 8—1941. 9	109
			1945. 10—1945. 12	5
			出版时间不详	2
		道林纸	1939. 9—1941. 6	30
			1945. 10	1
	土纸	漂白纸	1943. 12—1945. 5	53
		江西纸/江西重纸	1943. 8—1945. 10	20
		其他土纸	1943. 12—1945. 5	13
		浏阳纸	1943. 4—1945. 11	3
		横江纸	1944. 5	2
开明书店	进口机制纸	白报纸	1938. 2—1941. 10	39
	土纸	土纸	1940. 12—1946. 1	58
			出版时间不详	1
生活书店	进口机制纸	白报纸	1937. 11—1940. 3	87
	土纸	土纸	1938. 9—1943. 10	57
		绿土纸	1940. 3	3
独立出版社	进口机制纸	白报纸	1938. 1—1939. 5	39
			1945. 9—1946. 11	6
		道林纸	1941. 3	1
	土纸	其他土纸	1938. 4—1945. 12	263
		熟料纸	1944. 3—1945. 11	16
		绿土纸	1940. 2—1942. 7	15
		浏阳纸	1944. 9—1946. 1	9
		生料纸	1944. 9—1944. 12	3
		溥泉纸(机制)	1944. 9	2
		土报纸(机制)	1944. 2	1
		机制土纸(机制)	1944. 4	1

由表 3 可知,在 1157 册抽样图书中,使用进口机制纸和国内本地产土纸的数量分别为 337 册和 820 册,占比分别为 29. 1%和 70. 9%。可见,土纸图书在大后方地区文献中占了绝大多数。该调研结果和笔者在民国图书库房的实际工作经验是基本一致的。此外,当时不少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机构”的官方文献也以土纸印刷为主,如 1939 年 4 月南岳干训班编印的《领袖言行》、1939 年 3 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编印的《领袖对青年之教训之立志为学与服务》《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提案原文》、1939 年 9 月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训练委员会”编印的《青年救国之路》等,这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当时土纸使用之广泛。

4 土纸文献的登场与退出

在此,笔者利用调研分析结果,对土纸文献集中出现的时间范围做一初步划分。

4.1 土纸文献的登场

从上述统计可知,五家书局用纸变化的时间历程存在着比较明显的差异,如表4所示。

表4 五家出版机构图书用纸变动时间对照

出版机构	进口机制纸(新闻纸、道林纸)图书时间范围	各类土纸图书时间范围
商务印书馆	1938.2—1941.9	1942.3—1946.12
中华书局	1938.8—1941.9 1945.10—1945.12	1943.4—1945.11
开明书店	1937.11—1940.3	1938.9—1943.10
生活书店	1937.11—1940.3	1938.9—1943.10
独立出版社	1938.1—1939.5 1945.9—1946.11	1938.4—1946.1

由表4可见,早在1938年,开明书店、生活书店、独立出版社所出图书中就已经出现了土纸书,而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所出图书中则分别到1942年和1943年才出现土纸书。这些时间点上的差异绝非偶然,结合相关史料,可以梳理出大量利用土纸印刷的两个重要时间节点。

时间节点一:1938年下半年至1939年初。1938年11月,作为出版业重要据点的长沙发生"文夕大火",出版界损失惨重,仓皇西撤,目的地主要为重庆和桂林。且此前已有撤进重庆、桂林的出版机构,两地已经成为名符其实的战时出版中心。当时两地的进口纸供给已经十分吃紧,桂林"白报纸奇缺"[10](54);而重庆新闻纸价格一路暴涨,2月间每令十七元[11](29),到了9月"每令最高价竟达廿余元"[11](200),到了11月前后,"涨至四五十元"[11](271),令不少书局不堪重负。于是土纸开始逐渐取代洋纸。独立出版社于1938年3月迁至重庆,到了4月就使用了土纸印刷[12](339)。而到了12月,更是直接宣布今后改用土纸出版:"本社迁渝续刊,因战区日广,内地交通渐行阻隔,报纸来源几濒于绝,纸价渐飞涨,兹为提倡国产,减低成本,节省读者经济负担起见,自十二月起,改用四川土纸印刷,想亦为读者所乐闻。"[13]生活书店则决定"移渝出之各种什志及新书、重版书,均改用土纸"[11](200)。1938年底,开明书店在桂林设立总办事处[14](133)。据唐锡光《开明的历程》一文回忆,1939年,开明书店利用上海运来的纸型在桂林用土纸印书,"成为战时内地土纸印书的滥觞"[15]。唐先生的回忆似不甚确切,至少独立出版社就比开明书店更早用了土纸印书,不过若以唐先生的回忆反推,可能开明用土纸印书在桂林地区算是比较早的。至于用土纸印书的"发明权"该给谁,目前尚未看到确切的记载。类似的记载,还有一些。1939年4月9日《申报》载文称"重庆报纸仍有十家以上,新闻来处皆出一源,加以纸张油墨价格飞涨,多数已用土纸印刷。"[16]8月7日又报道称,因重庆大空袭而停刊报纸准备恢复出版,"惟因进口纸张售价过昂,故各报此后均不用新闻纸,而改用本国出产之土纸"[17]。除了西南几省外,其他一些地区的出版物也相继采用土纸印刷。据《申报》1939年3月的报道,西安等地采用土纸印刷报纸,并称赞此举减少国家资金外溢,"确实是个可喜现象"[18]。同年7月11日的《申报》报道称,浙江省战时教育文化事业委员会曾先后召集全省刊物主编及金华区刊物主编,讨论各报各刊物采用土纸问题,该会还以淡色土纸试印《老百姓》旬刊数期,结果颇称满意;又据该文报道,浙省东南日报、正报、决胜印刷所等均已自七月一日起采用土纸,其他各地书店、杂志社等,亦均纷纷响应,或已改用土纸[19]。从这些记载可以大体认定,1938年下半年起,大后方出版物已经逐步采用土纸印刷。

时间节点二:1942年。上海沦陷后,日军并未进入租界区。成为战时孤岛的租界区印刷设备齐全、纸张供给相对充足;同时由于印刷厂客源不足,低价揽客,印刷成本亦较为低廉。这些因素使不少具备一定经济实力的出版机构将租界作为重要的造货基地。1938年10月,中华书局将其上海印刷厂更改为美商永宁公司,"那时上海已经沦陷,华人在租界办的企业,挂外商牌子,这是

适应环境的一种方式”[20]。从实物看,这一时期中华书局图书版权页印刷所一栏,基本上标注为“美商永宁公司”。生活书店上海分店改称远东图书公司,计划利用当地优越的印刷条件继续出版大量书籍[10](146);但由于时局变化和政治形势影响,计划未能完全实现,在上海印制的主要是大部头学术著作和文艺名著[21]。

除上海外,香港也因交通便利、纸张供应充足和印刷机构众多而成为重要的造货基地。商务印书馆在香港本就设有工厂,上海沦陷后,香港就成为该馆重要的造货基地,“自1937年10月1日恢复出版新书,到太平洋战争发生之日,除了出版许多战前尚未出齐的大部丛书外,每日至少还能维持一种新书之出版,而没有一日间断。”[14](62)中华书局在香港也设有工厂,负责内地课本的造货,“依靠港厂这条路子使大后方的课本供应仍无虞匮乏”[10](91),至于其他出版物则印刷不多[14](62)。生活书店也于1938年7月在香港成立分店,在香港印刷书刊,供应内地[14](63)。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香港两个重要造货基地同时丧失。商务印书馆在重庆成立总管理处,并在重庆、成都、江西赣县和湖南邵阳四地设厂造货。1942年3月起,在重庆继续出版新书[22](229)。这也就说明了抽样统计中商务印书馆土纸书自1942年3月始的原因。中华书局于1942年3月在重庆成立总管理处[22](107),在赣、蓉、桂、渝所印课本[22](110)。1943年继续出版新书,当年出版新书47种[22](115)。中华书局的样本土纸书最早为1943年4月,正与史料相互印证。香港、上海两个造货基地的丧失,使西南地区几乎成为大后方唯一的纸张供应地,无论书报刊都只能以土纸印刷。

总而言之,从尝试用土纸出版,到土纸全面“占领”出版界,大体经历了四个年头。

4.2 土纸文献的退出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国外进口纸张逐步恢复,土纸使用亦随之减少。据文化生活出版社同仁回忆,“1945年秋抗日战争胜利了,各行各业以及个人都忙于筹划复员,重返故里,土纸书的销路大成问题,业务几乎陷于停顿”[10](245);耕耘出版社也有类似遭遇,“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白报纸的图书、期刊很快运到重庆,土纸本图书一下子失去市场。‘耕耘’在重庆印的一批土纸图书,最后只得称斤当废纸出售”[10](329)。由此可知,土纸退出的速度还是比较快的。1946年底,各家出版机构基本完成了复员东迁的工作,上海重新成为出版中心。出版物的“土纸时代”也就基本终结。不过由于战后国内经济形势日趋恶化,加之国民政府将印刷纸作为统治物资加以管制,纸价暴涨,进口机制纸经常是有价无市。西南地区出版机构为了降低成本,在一定程度上还在使用土纸印刷。例如1947、1948年间在重庆出版的《大公报》除了新闻纸(白报纸)之外,同时还用嘉乐纸、生料纸、熟料纸等土纸印刷[23]。

5 土纸文献保护利用的若干建议

土纸文献是民国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鉴于其产生于特殊时期,土纸文献承载了特殊的历史信息,因而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价值。比如,土纸文献中包含了大量抗战文献,是研究抗战时期大后方地区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重要一手资料,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此外,从出版文化角度来看,土纸文献也具有重要的学术研究价值。因当时的政治环境和经济状况,土纸文献的装帧排版较之战前文献已有了很大的变化。抗战时期大后方地区的出版模式也因战时环境和交通限制有了较大变化,从战前的集中造货改为分区造货,因而土纸文献是研究民国时期出版文化史、书籍史的重要资料。由此,加强对土纸文献的保护应当成为民国文献保护工作的重要内容。在此,对土纸文献的保护利用工作提出几点建议。

5.1 依托既有成果,对土纸文献存藏情况进行摸底

土纸文献的时间、地域特点相对比较明显,建议文化主管部门或学会组织充分利用《民国时期总书目》《抗日战争时期出版图书联合目录》和民

国时期文献保护计划建立的“民国时期文献联合目录”等,对主要图书馆土纸文献的存藏情况进行系统梳理,并以适当形式对摸底成果予以发布。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还可对各个图书馆土纸文献的破损情况一并摸底,以便于下一步的保护工作。

5.2 开展土纸文献保护策略研究

土纸文献相对于其他机制纸文献而言,纸张老化程度较轻,纸张机械性能普遍优于其他机械纸。据南京图书馆的抽样测定,目前手工土纸图书ph均值为5.436,高于机制纸图书近两个点[24]。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土纸出现普遍性老化只是时间问题,应当未雨绸缪,早做准备。一是建立土纸理化特性数据库。大后方地区所产手工土纸的生产工艺虽然基本沿用古法,但是当时曾经在四川等地开展过改良工作,对造纸原料、生产工艺进行调整优化,以期提高生产率。机制土纸的原料大多也是就地取材,经过改良后才采用机械化方式加工。因此,土纸的成分构成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建议针对不同产地、不同名目的土纸开展理化特性分析,为今后的保护工作提供基本依据。二是加强对土纸文献的油墨理化特性的研究。土纸文献的油墨多是就地取材用土法制造而成,其化学稳定性直接关系到文献寿命。建议对油墨的理化特性加以分析研究。三是针对土纸脱酸修复策略开展研究。土纸文献数量大,开展脱酸和相应修复是一项较为复杂和长期的工程。建议根据文献的历史价值、损毁程度、纸张理化特性、复本量等因素,统筹考虑,研究制定出较为合理的脱酸和修复策略。

5.3 开展土纸文献整理

大后方地区的土纸文献中除了由出版机构出版的文献之外,还有不少属于政府机关、社会团体、学术研究机构刊行的文献,这些文献中也包含了大量的重要史料,但目前由于缺少索引工具,利用不便。建议在民国时期文献保护计划的框架下,相关藏书机构、图书馆等联合起来,进一步加大文献整理力度,采取影印出版、数字化发布、专题目录索引编制、专题文献汇编等方式,不断挖掘文献价值,方便读者利用。

5.4 开展相关出版文化史研究

“造纸业与制书业,彼此总是有着密切关系。”[25]在抗战大后方的特殊环境下,土纸的生产供给对出版业有着直接影响。例如出版机构在选择造货基地时必须考虑土纸供给的便利程度,而土纸的品质又影响了图书装帧的风格,纸价的波动还是出版物价格变动的重要因素。同时,出版业的西迁也对大后方的土纸业带来了很大影响,大后方出版业的发展促进了手工纸业的发展。以四川为例,1938年和1943年相比,四川省手工纸年产量增长5000余吨,增幅达到31.25%[6](216)。这一数字足以说明手工纸业在出版业的带动下注入了新的发展动力。大后方出版业的发展还带动了手工纸的技术改良。总之,在战时大后方的特殊环境下,土纸业与出版业之间建立了紧密而复杂的关系,考察这一特殊时期两者之间的互动,对于民国时期出版文化史研究是有其独特价值的。

参考文献

1 钟崇敏,等.四川手工纸业调查报告[M].重庆:中国农民银行经济研究所,1943.
2 莫古黎(F.A.Maclure).广东的土纸业[J].岭南学报,1929(1):44-60.
3 本港粤桂闽土纸市况[N].申报,1939-01-12(06).
4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轻工业发展战略研究中心.中国近代造纸工业史[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5 荣杰.民国时期出版印刷用纸情况初探[M]//出版史料:2015年第一辑.北京:开明出版社,2015:108.
6 子南.报纸价格暴涨[N].申报,1937-01-13(20).
7 洋纸进口供过于求[N].申报,1938-11-04(04).
8 吴永贵.民国图书出版史编年:1912—1949

(中)[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971.
9 曹和仁.纸贵横江[J].中国合作,1940(2-3):61.
10 《重庆出版志》编纂委员会.重庆出版纪实[M].重庆:重庆出版社,1988.
11 北京印刷学院韬奋纪念馆.店务通讯排印本[M].北京:学林出版社,2007.
12 叶再生.中国近代现代出版通史(第三卷)[M].北京:华文出版社,2002.
13 本社启示(1938年12月)[M]//独立出版社图书目录.重庆:独立出版社,[出版年不详].
14 张定华,等.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出版史[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9.
15 唐锡光.开明的历程[M]//我与开明.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5:305.
16 君邃.重庆一瞰[N].申报,1939-04-09(03).
17 重庆各报行将复刊[N].申报,1939-08-07(03).
18 值得重视之浙省造纸工业[N].申报,1939-03-06(06).
19 内地报纸改用土纸[N].申报,1939-07-11(09).
20 李湘波.我和中华书局上海印刷厂[M]//回忆中华书局(1912-1987)上编.北京:中华书局,1987:193.
21 生活书店史稿编委会.生活书店史稿[M].北京:三联书店,2007:153.
22 中华书局编辑部.中华书局百年大事记(1912-2011)[M].北京:中华书局,2012:229.
23 叶再生.中国近代现代出版通史(第四卷)[M].北京:华文出版社,2002:739-740.
24 顾晓宁.民国文献保护的思考——基于南京图书馆民国文献酸化抽样测试结果[J].图书情报工作,2014(增刊):62.
25 费夫贺,马尔坦.印刷书的诞生[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14.

(荣　杰　副研究馆员　国家图书馆)

收稿日期:2019-02-11